

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初探

——走过的路与要走的路

付才辉¹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摘要：过去三十多年来，新结构经济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解读中国经济奇迹阶段（1988-2007年），第三代发展经济学阶段（2008-2018年），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阶段（2019年往后）。第一个发展阶段表明中国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金矿，第二个发展阶段表明中国实践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第三个发展阶段表明人类经济学知识体系已经处在新一轮革新的前夜。未来三十年（2020-2050年）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力争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而走向成熟。以思想原理为基础夯实学术理论根基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禀赋条件，以教材课程为牵引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自生能力，深化中国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因势利导。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学科改革

一、新结构经济学学科过去三十年的三个发展阶段²

2019年，首部新结构经济学学科通论教材《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³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开创者林毅夫的学生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建设者，我将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8-2007年的二十年，2008-2018年的十年，

¹ 本文获得北京大学课程设计与学科建设项目支持，也吸收了林毅夫、平新乔和吴岩等同仁的真知灼见。

² 这里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学术、学科与专业的区别联系，第二部分再进一步展开。学术(Academic)就是搞研究。学术研究是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探讨和得出结论，其结果应该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是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所谓学科(Discipline)则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目和分支。它与专业的区别在于它是偏就知识体系而言，而专业偏指社会职业的领域。因此，一个专业可能要求多种学科的综合，而一个学科可在不同专业领域中应用。因此，作为学术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学科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门科目体系，作为专业的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门社会职业。新结构经济学最早由林毅夫于2009年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学科最早由付才辉于2015年提出，2019年和2020年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专业已经在北京大学等开始研究生和本科生层次的试点。

³ 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2019年往后的数十年。⁴每个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化的重心和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在“一以贯之”地不断深化和一般化。当然，作为一个学科的新结构经济学远未成熟，所以第三个发展阶段才刚刚开始。

（一）解读中国经济奇迹：1988-2007年

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概括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⁵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交汇点发端于1988年林毅夫对中国政府不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以及印度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同却同样以计划来配置资源的思索，而悟出了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扭曲内生于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正是中国发展故事的理论化身，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萌芽表明了中国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第一阶段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阶段，虽然还没有出现新结构经济学的提法，但基于中国经济的系列研究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1994年林毅夫与蔡昉、李周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⁶，标志性的教材成果是2008年林毅夫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夕首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后增订的《解读中国经济》⁷，标志性的教学成果是林毅夫于1996年在北京大学开设至今的“中国经济专题”。这一阶段，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围绕《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些典型文章被收录在2012年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中。⁸这一长达二十年的漫长阶段，可谓“厚积薄发”，为第二个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发展上的实践应用以及第三个发展阶段在经济学思想理论上的结构革命奠定了中国历史逻辑基础。

⁴ 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7卷第2期，第729-752页。

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⁶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1994年。

⁷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⁸ 林毅夫等，《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二）第三代发展经济学：2008-2018年

第二阶段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初步发展阶段。2009年林毅夫在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研讨会上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名称，并倡导以此作为继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和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2007年林毅夫根据其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¹⁰这个十年的新结构经济学发展远远走出了象牙塔，也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标志性的事件便是林毅夫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出任历来由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们知道，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是战后最重要的多边国际发展机构，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然而，全世界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努力，诚如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所测算的，倘若除去中国的扶贫成就，世界的贫困有增无减，人类离“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的愿景仍相去甚远。¹¹中国人讲思路决定出路，一定是过去世界的发展思路出了问题，才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需要予以反思。¹²

因此，林毅夫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旗帜鲜明地反思了战后第一波旧结构主义思潮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归结起来，前两代的发展经济学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第一代结构主义强调的现代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或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好的地方(如第二代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完善的市场制度，即“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以及营商环境、透明度等)，并以此作为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依据。结构主义忽视发展中国家禀赋结构特征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低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力量，高估了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扭曲，内生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大企业生存的前提，低估了政府因势利导在结构变迁中的必要性，高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这两波发展思潮均未能有效地指导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少数成功地实现追赶发达国

⁹ Justin 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ume 26, Issue 2, August 2011, Pages 193–221.

¹⁰ Justin Yifu L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¹¹ Angus Deaton,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¹²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内部也在不断反思其曾经流行的思潮，新的范式风起云涌，我们不能抱残守缺。

家和转型升级的经济体，也都未遵循这两波主流发展思潮。与前两波发展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规划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把现在能做好的产业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的因势利导协助企业家将其做大做强，以此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与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分析发展与转型的因素及结果的研究范式不同，突出发展与转型方法和过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成因，提出求真务实的对策，而非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一刀切”。¹³这些正反面教训正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所经历过的，这也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表明了中国实践具有一般理论意义，与此同时这种实践上的发展思路的转变也蕴涵了理论上的研究范式的转变。¹⁴

(三) 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2019年往后

由于肩负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开创了发展经济学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子领域或子学科，即便在发达国家也盛行一时，很多大学曾经都有发展经济学的专业设置。然而，战后二十多年间，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做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随之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体制和理论来发展和运行其经济就可以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子学科因而式微。¹⁵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自娱自乐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至此已分道扬镳。¹⁶新结构经济学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克服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道扬镳，逐步催生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式革新。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起始于中国的转型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在推动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¹⁷现代主流的经济学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经常使用没有结

¹³ 相关的新结构经济学教材：林毅夫、付才辉，《解读世界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¹⁴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学习与探索》，2017年05期，第133-145页。

¹⁵ 例如，在美国除了威廉斯学院和范登堡大学之外就没有其他大学专门设置发展经济学的学位项目，我国也邯郸学步，经济学学科目录中居然也没有发展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

¹⁶ 例如，哈佛大学巴罗教授在其经典教科书《经济增长》(第2版)导言开篇(第19页)就直言不讳：“The work of Cass (1965) and Koopmans (1965) completed the basic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Thereafter, growth theory became excessively technical and steadily lost contact with empirical applications. In contrast, development economists, who are required to give advice to sick countries, retained an applied perspective and tended to use models that were technically unsophisticated but empirically useful. The fiel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drifted apart, and the two areas became almost completely separated.”

¹⁷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一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经济评论》，2017年03期，第81-103页。

构的一个部门模型来代表整个经济体，¹⁸或是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理想的结构。在前者的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后者则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都当作是应该消除的扭曲。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制度等的不同反映的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的不同，也有和不同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不同，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都当作是扭曲来对待。并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为理论时，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以发达国家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为理论的前提或暗含前提，运用这种理论于不存在相同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时，难免会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如何从一个较低的结构升级到一个较高的结构属于“发展”的问题，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转变则属于“转型”的问题，同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收入水平不同，其规模、风险、交易等等的特性也会不同。既然这些结构差异是内生决定的，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金融、教育、产业组织、创新、区域布局、货币、财政、法制等关系到经济“运行”各个经济学子领域的一些原则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密集、规模大，技术创新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以小规模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为主，所用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技术，那么，合适的金融安排必须反映这个产业技术结构的差异性才能最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因此，把结构的内生性引进以后，现代经济学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各个子领域的理论都需要重新审视，这有助于重新梳理和重构人类目前已知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二、新结构经济学学科未来三十年应开创的新局面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阶段，激动人心，但是这一阶段才刚刚开始，任重道远。未来三十年（2020-2050年）将是新结构经

¹⁸ 目前一些学术期刊中也涌现了一批研究库兹涅茨特征事实的多部门模型文献，不少与新结构经济学的议题是一致的，但整体上的范式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依然是给定结构的跨部门跨期的资源配置，即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的具体应用。更多讨论可参考：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第129-138页。

济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力争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而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就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强国，而且也是社会科学的强国。¹⁹因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机遇，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一个座谈会上也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²⁰因此，要把握住时代机遇，开创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新局面，未来三十年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大量艰苦卓越的基础性工作：

（一）夯实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原理

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术语讲，以思想原理为基础夯实学术理论根基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禀赋条件。事实上，支撑任何一门学科的根基就是其基本原理。所谓的原理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是在大量观察、概括而得出的，既能指导实践，又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某一门具体学科的基本原理就是其研究对象的基本规律，而且往往都非常简洁明了。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马克思主

¹⁹ 林毅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一个关于世界经济中心必将向中国转移的著名论断：我国现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35年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逐渐转移到美国一样，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必然逐渐转移到我国。从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一直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我们应该也有实力和自信，迎接世界经济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的转移。这个论断可参考：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²⁰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组成，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石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并不复杂，我国高中生的课程都予以了普及。又比如，现代经济学的本体也可以简单归纳为理性选择原理。²¹新结构经济学秉承了唯物辩证法从每一个时期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分析经济结构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门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学科。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经济学的运用，同时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由此可知，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发展——本质是经济结构的升级；经济转型——本质是结构扭曲的改革；经济运行——本质是经济结构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的关系。可以说，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根基就在于总结其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这就需要加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来揭示这些基本规律，这不但是过去三十年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未来三十年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性工作。

一个经济体是各种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复杂系统。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把这些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都能内生，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给予自洽的解释的理

²¹ 关于经济学的“本体”可参考：林毅夫，《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曼昆在其流行的教材《经济学原理》将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概括为十大原理：分析人们如何做决策的四大原理——人们面临权衡取舍、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理性人考虑边际量、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分析如何相互交易的三大原理——交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分析整体经济如何运行的三大原理——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涨、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分析整体经济运行的三条原理虽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共识，但是具体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理论中仍然存在分歧。例如，在基于发达国家经验总结的主流理论认为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取决于自主发明的前沿技术进步；而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前沿内部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取决于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技术结构与生产结构的持续升级。同样，物价、通货与失业这些经济周期现象即便在主流的不同学派中也充满争议。同样，分析交易的三大原理虽然已经成为经济学共识，但是具体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理论中仍然存在分歧。新制度经济学派便深刻地拓展了对交易原理的认识，从而被称之为“缔约的科学”。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相对于旧制度经济学是“新”的，便是应用新古典理性选择方法来分析制度安排现象。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也引入了“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等行为人特征来超越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狭义的“理性”与“利己”概念，这些其实也是行为经济学的新进展。所以，分析决策的前四条原理是曼昆总结的十条原理中最基础的，但是第四条原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实可以由前三条原理推导出来。因为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做出决策，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所以，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便是前三条，也即现代经济学的本体。

论体系。要有这样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则需要找到一个在一个经济体中属于最根本的、可以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林毅夫认为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唯一能够把上述各种环环相扣的内生现象像抽丝剥笋一样一层深入一层的解析，或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刀下去都迎刃而解的自变量就是一个经济体在任一个时点上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林毅夫所发现的这一变量犹如科斯发现了“交易费用”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变量。²²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最重要的出发点，其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石“世界物质性”异曲同工。²³目前，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概括这些基本规律，但是依然需要不断深化。²⁴

我不揣浅薄，为了讲授与写作的组织便利，在教学研究和实践中曾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概括为十大原理，让初学者也能够对新结构经济学概貌有个初步了解。²⁵这十大原理按照逻辑依次从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与经济运行的思想体系中延展开来：前五条原理——禀赋结构的供给原理、禀赋结构的需求原理、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最优生产结构原理、结构变迁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揭示了作为发展本质的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第六、七条原理——自生能力原理与最优转型原理揭示了作为转型本质的结构扭曲的根源及其改革的策略的基本规律；第八、九条原理——政府因势利导原理与政府最优干预原理揭示了结构变迁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理；第十条原理——生产结构的供求原理则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即揭示了作为经济基础的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的生产力和相应生产关系与作为上层建筑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空间结构、开放结构、货币财政结构、环境结构与制度结构等结构安排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亦即经济结构变迁中的经济运行原理。这十条原理大致囊括了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结构变迁世界的学说。目前，虽然按照这些逻辑线索可以串起大量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关文献

²²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o. 16. (Nov., 1937), pp. 386-405.

²³ 赵鼎新对此做了个有见地的评论：“用希腊哲学来说，就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必须自变量少，因变量大。也就是用最简单的东西，来解释的东西越多越好。从这个角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漂亮的理论。在逻辑上，它用生产方式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用一根小筋挑动全世界。就像杂技演员，他手上要耍五百个球，在下面还能扔着玩，这当然是很厉害。”（赵鼎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真正区别，2014年9月28日广东财经大学讲稿。）新结构经济学更进一步，马克思讲的这个生产方式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并且禀赋结构又是内生于结构变迁系统的，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简单而封闭的可以用以解释人世间经济社会万物变迁的强大理论。

²⁴ 所谓的理论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概念体系，可以用来解释一种或一系列现象。

²⁵ 见《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第1章。

以及在范式上重构大量与结构变迁密切相关的研究,但是还需要发挥“闭门造车”的“冷板凳”精神细扣每一个理论链条的逻辑环节以及各种结构安排之间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²⁶其实,每一个领域的核心概念并不复杂但其威力无穷,新结构经济学也应该如此,围绕基本概念不厌其烦地在各个领域予以拓展检验。²⁷

虽然,诚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说:“科学大厦的建立并不像盖房子那样要先打好所有的基础,然后再去建造和扩充房间。科学更喜欢尽快地获取宽裕的遨游空间。只有当后来的种种迹象显示出其松散的基础无法再承受房间扩建的重压时,才设法对其进行支撑与加固。这并不是一种缺陷。相反,这是一条正确健康的发展道路。”不过,当一门科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知识,需要按照逻辑顺序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时候,公理化方法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并且,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也只有公理化之后才能成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每一科学理论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命题组成的体系。所谓公理化,就是建立公理系统,用公理方法研究理论体系。公理化的实现需要以初始概念和公理作为公理系统的出发点。从其诸多概念中挑选出一组初始概念,该理论中的其余概念,都由初始概念通过定义引入,称为导出概念;从其一系列命题中挑选出一组公理,而其余的命题,都应用逻辑规则从公理推演出来,称为定理。应用逻辑规则从公理推演定理的过程称为一个证明,每一定理都是经由证明而予以肯定的。由初始概念、导出概念、公理以及定理构成的演绎体系,称为公理系统。因此,现阶段就需要推进的工作是如何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一初始

²⁶ 例如,城市化随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有一般性规律,但是加入全球化的开放结构之后会有何不同?与马铃薯的全球传播有助于城市化一样,当今很多欠发达国家也可以依靠食物国际贸易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如果按照英美城市化历史的标准,那么其实当今很多贫穷经济体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都超过了英美当年的城市化水平。战后全球的城市化率对收入水平的时序回归系数为0.25左右,而欠发达经济体的这种关系系数大得多。哈佛大学的 Glaeser 教授对人均收入水平低于 5000 美元的经济体做了估算,发现城市化率关于人均 GDP 对数的回归系数,在 1960 年的横截面数据中是 3.6 (标准差为 0.24), 2010 年的横截面数据中是 5.3 (标准差为 0.35)。尤其是相对于 1960 年, 2010 年这种关系系数变得更大而且标准差更大,反映了欠发达经济体更加超前的城市化以及收入水平更低但城市化水平更高的经济体更多。(Edward L. Glaeser, “a world of ci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rbanization in poorer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ume12, Issue5 October 2014 Pages 1154-1199)。更多的相关内容可参考:林毅夫、付才辉,《解读世界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除了这个空间结构与开放结构之间关联的例子之外,不同结构安排之间的前因后果也错综复杂,需要细细研究。

²⁷ 举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例子,威廉姆斯凭借新制度经济学核心内容的 TCE (交易费用经济学) 获得 2009 年诺奖, Macher 和 Richman (2008) 的一篇文章综述了社会科学以及经济生活领域围绕 TCE 核心概念“资产专用性”开展的数百项实证研究检验 (Macher, J., & Richman, B. (2008).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 Assessme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usiness and Politics*, 10(1), 1-63.)。顺便提一点,《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第 19 章第 2 小节介绍了哈佛大学 Nunn 教授一项用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不同行业不同的“资产专用性”指数,其后也引发了不少相关研究,就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逻辑重构的重要中间环节。在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中,产业结构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当然,不同的产业结构就有不同的“资产专用性”结构分布,对应的各种契约结构制度安排也就随之不同,并随产业结构变迁而变迁。

概念出发,挑选出一组公理,形式化新结构经济学整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是在学科走向成熟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从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到德布鲁完成公理化整整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岁月。

(二) 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从前面对新结构经济学思想原理的简单介绍便可以知道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结构变迁世界的经济学学说。众所周知,经济学学说流派纷呈,但大家比较公认的主流是从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列宁等),古典经济学经过边际革命之后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包括马歇尔、瓦尔拉斯等),大萧条之后诞生了凯恩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两者经过萨缪尔森合并在一起称之为“现代经济学”,其实是西方经济学。²⁸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的科目和分支来讲,很多人的认识停留在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然而,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现代经济学的本体是“理性选择”,因此采用这种“本体”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流派包括:配置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行为分析(行为经济学)、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结构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所以,就学科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门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并驾齐驱,如前面所指出的虽发端于转型与发展经济学,但涉及所有的经济学领域。

因此,要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就需要再理清楚其在整个经济学思想史上的脉络方位。经济学是经济学家们创造的知识体系。经济学家们为了研究的需要往往将复杂的现实世界抽象为简化的理论世界。林毅夫深刻地指出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世界舍掉了现实世界中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最重要的结构差异和动态变化,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谬误。正如萨缪尔森在两个剑桥论战中所败给的对对手琼·罗宾逊夫人,这位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在1956年参与两个剑桥之争的著作《资本积累论》开篇第一句话毫不客气地说道:“两百年来为了了解‘国家财富的性

²⁸ 参见萨缪尔森最经典的教科书《经济学》第十九版最后的附录。

质和原因’而进行的经济分析,已经被人用另一个新娘——价值论——骗过去了。毫无疑问,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可是也有一种纯粹的、知识上的原因。要分析一个经济组织在整个时期内,牵涉到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全面动态,同时又要分析具体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详细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两套问题都需要解决,可是每套问题都必须分开研究,用简化假设的办法把另一套撇开。两者之间究竟先牺牲哪一方面呢?一百年来经济学家牺牲了动态学说,以便讨论相对价格。这是很不幸的!”²⁹林毅夫更直白地指出了罗宾逊夫人的论断:目前主流经济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忽视了结构因素,或者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都映射到发达国家的结构中来考虑,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特性。³⁰新结构经济学事实上已经统一了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这两套问题”(资源配置和结构变迁)。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与其他现代主流经济学流派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所采取研究方法是一致性的,并且在研究范式上更加高阶,用林毅夫的话讲就是“从二维经济学到三维的经济学”,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目前各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是目前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最核心的分析框架。然而,这一分析框架以给定的偏好(效用函数)、技术(生产函数)与资源(禀赋)为前提条件来研究无摩擦世界的最优资源配置(也就是林老师讲的二维经济学),整个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的理论进展就是不断深化对

²⁹ 琼·罗宾逊(1956),《资本积累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圣塔菲学派的布莱恩·阿瑟也给出了类似的评论,其认为经济学向来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内部的资源配置(allocation)问题:在市场内部和不同市场之间,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及它们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由一般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博弈论等伟大理论来代表。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内部的形成(formation)问题:经济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又是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长起来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体现在关于创新、经济发展、结构变化,以及历史、制度和治理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的思想上。配置问题现在已经被理解得比较充分,而且也已经高度数学化了。但是对于形成问题,经济学界现在的理解还很少,也几乎没有数学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直到1870年前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两个问题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斯密、穆勒和马克思都努力尝试过,从理性科学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与此同时,他们对经济形成问题、治理问题和历史问题,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伟大的边际主义革命和一般均衡革命。在严格的理性假设和均衡假设下,它们使得资源配置问题转化为一个代数问题和微分问题。但是,经济形成问题却无法进行这种转化。这是因为就经济形成问题的本质而言,它既不能被限制为静态的,也不能被限制为理性的。到了20世纪,数学化的理论被当成唯一的“理论”,因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大潮与经济形成问题擦肩而过。”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第1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然而,遗憾的是,不论是历史上以罗宾逊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还是现在以阿瑟为代表的美国圣塔菲学派,其也都在致力于推动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但是其不再采取新古典的主流传统,否认理性选择与市场均衡,因此显得非主流。

³⁰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5-15页。

这几组前提条件的研究，使得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退化的理论特例。³¹行为经济学增进了对现实世界中具备真实情形的心理社会特征的偏好行为的一般化理解。例如，行为经济学最核心的前景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期望效用理论成为其退化特例，心理账户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预算约束成为其退化特例。新制度经济学增进了存在交易费用有摩擦的真实世界的交易行为的一般化理解。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合同理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埃奇沃思盒中的契约曲线成为其退化特例。新结构经济学增进了对在禀赋条件约束下技术和产业（生产函数）选择及其变迁的一般化理解，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其实只是新结构一般均衡的退化特例。³²正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是所有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基础一样，由禀赋结构内生的技术和产业（生产函数）是所有以结构变迁为核心的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基础。由此可知，新结构经济学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底层的分析框架层面上，是可以覆盖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进阶，是更上一层楼的范式更替。³³

再回到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上来，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金融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的供给、需求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等，劳动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劳动市场的运行等，新制度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

³¹ 可参考经典的教科书：安德鲁·马斯-克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微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平新乔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关注微观经济学，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有个巨大的革命——信息革命（信息经济学）。这个革命完成了，这个革命产生了机制设计理论，主要经济学领域是研究怎么样搞组织设计，合约设计，制度设计；在这个领域里面，研究产业组织各种策略互动、行为互动所发生的效应。但对结构供给侧方面没有涉及。最近20年，整个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突破，还是那些东西，经济学停滞了20年了，不要说中国，世界也是这样，很多是在微观计量方法论上有突破，但是重大理论突破没有。这也是符合经济学发展规律的，有点像100年前20世纪初经济学发展在一个时期内没有重大突破一样，经济学发展在积累基础，寻找重大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新结构经济学在林毅夫老师的带领下，制定这样的研究，会具有世界意义。”可进一步参考：林毅夫、付才辉，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教研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

³²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第129-138页。

³³事实上，经济学之父斯密在其《国富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两部开山之作中都同时覆盖了静态的资源配置和动态的结构变迁。众所周知，斯密的《国富论》有两个中心思想：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涉及静态资源的最优配置，劳动分工涉及动态的结构变迁。鲜为人知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有两个中心思想：收益递减的局部均衡资源配置和收益递增的动态的结构变迁。实际上，对于这两个中心思想而言，斯密和马歇尔其实都更加强调动态变迁的内容，“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在《国富论》中轻描淡写，劳动分工却浓墨重彩。马歇尔在1920年的《经济学原理》原著第八版序言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复杂。……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对于静态的资源配置，马歇尔采取了牛顿力学分析范式；对于动态变迁，马歇尔却旨在采取生物学类比。然而，遗憾的是，如前所述，李嘉图重新调整了斯密对经济学本质主题的关注，将动态增长议题转向了静态配置议题上。边际学派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彻底抹掉了动态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动态议题的复兴之后。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更多讨论可参见：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度和制度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不同的是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是相同的。³⁴更进一步,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研究对象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和统一的底层逻辑,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一个经济体是各种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复杂系统。新结构经济学统一的底层逻辑就是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内生出生产结构,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的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生性。在此基础上,再从生产结构出发内生出金融结构、劳动结构、空间结构、开放结构、环境结构、制度结构等结构安排,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内生性。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子。³⁵所以,不论是从

³⁴ 林毅夫,“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经济学教学经验,在首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非常明晰地指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经济学思想史上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探索的区别联系:“新结构新在什么地方?经济学里面也不是说没有人讲结构,凯恩斯以后,罗宾逊夫人,哈罗德、卡尔多、包括希克斯这批人都是讲结构的,受这批人影响的发展经济学也是讲结构的。这批人的书我都读了,我发现,他们讲结构,有什么特点呢?他们讲结构是反市场的,一讲结构就论证结构这个领域,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他们用来抗衡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结构起作用的地方市场机制就有限度,在非结构的匀质经济里,市场经济的机制是可以的,到了结构领域市场经济就失灵了,只有政府调控、政府统筹安排起作用。所以他用结构来证明不平衡,市场经济把事情搞糟,搞的不协调。他们主要讲这件事,包括希克斯后期好多著作也是讲这个事。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经典的教科书有没有结构呢?也不是没有结构,是有结构的。比如我们讲消费者理论,讲偏好,每一种效用函数就是一种偏好结构,这也是一个结构;每一种生产函数,比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比如CES生产函数,我们推出来就是一个生产结构。但是他推完就完了,只是水平的结构,他不讲结构的变迁,不讲结构的升级。那就是把结构看成是给定的,外生的。1985年开始我在北大经济学院教微观经济学,教了三十五年了,我要从经典的既定的经济学框架里研究结构变迁、研究结构转型、研究结构提升做不到,这当然主要还是我本人的水平所限,同时也反映出我所出的经济学理论是不足的。我是做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但是美国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一章讲产业怎么变迁的,没有一章讲产业怎么升级的,结构升级在现有的经典的产业理论里面是空白。所以我就说新结构至少有两个方面、两个维度是新的:第一,他跟旧结构,跟剑桥的旧结构有区别。旧结构讲结构就是非市场,讲结构就是市场限度,市场的不作为,市场失灵。但林毅夫恰恰相反,是用新古典、用市场主导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变迁,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恰恰是在承认市场的功能的基础上,来研究结构的变迁,这个就跟旧结构区分开了,跟旧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第二个方面跟新古典又有差别,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结构变迁,解释不了结构内生,解释不了结构升级。其都只是水平的转动,在同一条无差异线上移动,不能动态的研究一个结构,一个发展过程怎么变迁,怎么实现升级。从我的理解来说,以上两个维度,新结构经济学跟旧结构主义有差别,跟新古典经济学也有差别。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新结构新在什么地方。”可进一步参考:林毅夫、付才辉,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教研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

³⁵ 这里我们再一次转引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在首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的评论:“林老师也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专门讲他的学说是结构经济学,《资本论》第三卷有这个话:“我的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他讲的经济基础又叫经济结构,这是他的原话,而且他确实研究结构,研究19世纪的经济结构,产业革命以后英国结构的变迁。整个《资本论》第二卷就是结构,农业结构、工业结构、结构平衡,消费资料生产部类与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之间的结构平衡。第三卷讲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的平衡,结构失衡金融就危机,很经典。这块东西马克思以后没有再发展了,150年过去了以后,整个世界的金融、经济、产业、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没有人好好的总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总结经济发展,经济变迁的历史经验也是很珍贵的。新结构经济学既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为指导,又承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有用的,同时又用这个方法研究结构,并不是否定市场的,虽然结构也有市场经济不适应的一面,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用市场经济解释结构变迁,这实际上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都放在结构变迁的框架内,实际上也是可以统一的。这样会引起经济学巨大的革命。”可进一步参考:林毅夫、付才辉,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教研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

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上，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本身是非常严密的。

基于前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原理与基本范式，我在2015年就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大的经济学学科，应该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的学科布局。³⁶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和研究对象，我也初步勾勒了逻辑统一的新结构经济学若干子领域或子学科，如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空间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等。2019年我和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部学科通论教材中又进一步把与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的主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化，还勾勒了新结构创新经济学、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公共经济学等领域，并明确与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对标提出更高阶的新结构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对标提出更高阶的新结构增长理论。不过，不少同仁由于不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内涵以及整个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误以为是乱贴标签。其实，举例来讲，将前面提到的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领域已经催生了行为金融学，即便是在国内也已经有多如牛毛的行为金融学教材和课程。同样，也有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学领域的，逐步在形成（新）制度金融学。³⁷当然，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善绝非“一日之功”。例如，新制度经济学从1937年科斯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算起，至今发展了大半个世纪依然不能说成熟。

（三）建设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这个论断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契合了学科体系发展的规律。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点要由每一篇论文予以研究，但教材而非论文才是学科体系建构的最佳载体。教材所要求的是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必须对一门学科

³⁶ 付才辉，“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年04期，第1-80页。

³⁷ 如国内外的两个例子：张杰，《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制度金融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让·梯若尔，《公司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的《制度金融学导论》更偏宏观，诺奖得主让·梯若尔运用的是其所研究的激励理论和合约理论的方法，用一个模型贯穿始终，是微观新制度金融学代表作。新制度金融学的正式文献还可以追溯到威廉姆斯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应用于公司金融（1988）（Oliver E. Williams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Volume 43, Issue 3, July, 1988, Pages 567-591）和哈特将不完全合同理论应用于公司金融（1995）的尝试（可参考中译本：奥利弗·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中心思想、体系脉络、研究成果、实践应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有相对完整的呈现。因此，教材建设对学科发展而言，不仅仅为了知识传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体系建构的需要，尤其在学科发展早期。³⁸

当然，在学科发展早期，教材建设既重要，但也更艰难。新古典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各种教材层出不穷，今天任何一个高校的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教学的需要撰写一本这样的教材讲义。重复并不是难事，困难的是从无到有。与所有新兴学科早期的教材建设情况一样，现阶段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不可能是成熟标准化的，而应该是探索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学科引领性质的专著类教材。其实，不但《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就连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开设过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专题的教材《解读中国经济》也不是标准化的。传统的此类教材一般只是相关文献综述而已，但更有价值的是更具有原创性的系统性架构，即便是不太成熟的此类探索也意义非凡，比如大家熟悉的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通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随着教研相长、教学相长，这些不成熟的教材会越来越标准化，不但内容越来越标准化，而且表述也会越来越标准化。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思想原理的公理化其实是一个相同的过程。例如，凯恩斯的《通论》作为教材就很模糊，希克斯后来就尝试用 IS-LM 模型来阐述其思想³⁹，现在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内容和标

³⁸ 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在首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就此也做了精彩的评论：“新的学说诞生以后，应该是将这块儿的思路写入教科书传播，在传播当中得以发展、得以完善。这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规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基本上是大学教书时候的讲稿的改造，写书的时候他已经不教书了。基本的内容、提纲是教书的讲稿形式，不过写书的时候更加科学。那个时候经济学还没有进大学的经济学系，经济系最早是剑桥大学在 1907 年成立的，1907 年以前经济学的传播主要是在媒体上写小册子、写书，大学里面有经济学课，但是没有经济学系，传播速度比较慢。经济学家有了想法以后，就写信相互讨论，学说慢慢就完善。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 19 世纪中叶写的，因为他的书写的好，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马歇尔写了《经济学原理》以后就很少写论文了，他一辈子只写了十几篇论文，主要写了《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从 1890 年第一版到 1924 年去世以前出了第八版，中间不断地完善修改。这部书影响很大，影响至少半个世纪。就凯恩斯经济学而言，凯恩斯 1936 年出版的《通论》也是反传统的，是超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通论》出来以后，也是成为经济学的教科书，当然主要是研究生的教材，通过这样一个扩张、传播，经济学一个新的体系就出来了。《通论》传到美国时，萨缪尔逊还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做研究生，凯恩斯的书就成为美国当时一代年轻的研究生的教材，讨论经济危机、宏观、微观之间的协调、失业、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新一代年轻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心，这些年轻经济学家后来大都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写的并不清楚，也不通俗，当萨缪尔逊自己当老师时，1948 年就写了一部《经济学》，实际上是超越了凯恩斯。萨缪尔逊的这部《经济学》传播了 70 多年。任何体系都不完善，肯定需要不断的完善，需要用写教科书的办法传播学说，引起争议，提供更好的研究的平台、培养人才的平台、思想库的平台，学科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我很欣慰也很高兴林毅夫老师和付才辉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的出版。”可进一步参考：林毅夫、付才辉，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教参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即将出版。

³⁹ J. R. Hicks,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Vol. 5, No. 2 (Apr., 1937), pp. 147-159

准表述，但依然有很多逻辑链条悬挂着。⁴⁰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教材建设不但要继续在夯实思想原理的基础上推进公理化，逐步建设在核心内容上更加标准的教材，而且要鼓励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探索性地逐步推进各个子领域的教材体系。

现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各个领域教材编著需要侧重三个方面的内容才能更有助于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后劲：首先，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底层逻辑出发探索各个领域具体的结构变迁规律，按照对象现象本身的规律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原理及其逻辑体系，这样就可以很自然地形成教材框架；其次，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理清楚各领域从新古典到新结构的理论进阶路径，这既是条捷径也是必经之路，这样既可以突出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也能够覆盖传统主流的以新古典理论视角为核心的教材的基本知识点，从而使得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更高阶；⁴¹然后，通过这样的基本逻辑梳理和理论范式对比，就可以对该领域的作为教材素材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重构，哪些是传统的缺乏结构及其内生性的理论视角，哪些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如出一辙，大都可以一目了然；⁴²最后，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现象而非理论出发，但也必须在“知成一体”过程中不断完善，因此就要落脚到实践上，尤其是与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的政策实践。通过这几个环节的基础性工作，不但可以不断推进相关领域的新结构经济学教材内容的完善，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引领相关领域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和课程建设，进而加速通过教研相长、教学相长滚动完善。

⁴⁰ Mankiw, N, Gregory. 2006. "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4): 29-46.

⁴¹ 例如，应用新古典金融学的原理于环境问题，目前业已形成了绿色金融学；基于科技进步对金融系统供给面的影响，也催生了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学科。然而，从研究议题上讲，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也都可以叠加到新结构金融学中，绿色金融可以视为金融结构与环境结构的交叉，数字金融是技术进步对金融结构的供给面的影响或者是产业技术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交叉。

⁴² 即便是学界人士，目前对新结构经济学依然还有不少标签化误区，误以为林毅夫或者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机构的论著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成果。事实上，只要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并逻辑吻合，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实比比皆是，需要加以文献重构吸纳到相应的教材中。以我们正在遭受的疫情为例，不少关于疫情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就吻合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与逻辑。如一项研究探讨了中世纪晚期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in 1348-1350）对英国发展的深远影响：黑死病导致人口外生地锐减——人口锐减改变人地禀赋结构（从土地稀缺变成劳动稀缺）——人地禀赋结构改变导致农业结构变迁（土地密集的畜牧业相对劳动密集的种植业占比变大）；种植业相对畜牧业而言是体力活，女人在畜牧业上相对更有比较优势——农业结构变迁导致女人就业结构变迁——女人就业结构变迁导致其婚姻结构变迁：女人开始变得晚婚晚育——婚姻结构变迁又导致人口结构变迁：女人晚婚晚育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导致禀赋结构变迁；工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Voigtlä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3. "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2227-64.）。又比如，一项研究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0-2011年到2016-2017年7个流感季的流感数据，以及劳工统计局（BLS）的就业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了就业对病毒传播的影响：在流感爆发期，美国的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与流感相关的医院就诊量就上升16个百分点。但是这个影响随着行业的不同而不同，需要人员密切接触的行业影响较为严重，比如零售和医疗，以及学校。而有些行业就业率上升对流感传播没有任何影响，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Markowitz, Sara & Nesson, Erik & Robinson, Joshua J., 2019, "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on influenza rates,"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vol. 34(C), pages 286-295.）。

（四）设计新结构经济学的课程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现在已经以各种形式大步走进了海内外的课堂。追根溯源的话，新结构经济学最早的相关课程应该是林毅夫从1996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第一门正式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课程是我从2016年开始在北大开设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课程。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作为清华本科教育改革试验田于2018年开始也将新结构经济学课程作为通识教育“政经哲”（PPE）的经济学必修课。我目前是每年春季学期在北大开设《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公共课，秋季学期在清华开设《新结构经济学分析》通识课，《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便是根据北大和清华这两门课程的讲义改写而成。由此可见，新结构经济学的很多领域不见得需要等到相应的教材出版了才能开设相应的课程，教学可以而且应该走到科研的前面。其实，当今很多经典教材都是讲义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国富论》其雏形也是他当初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更不用说了。目前，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也有这样的例子，虽然还没有教材但已经开课。例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周皓教授从2017年开始开设的《中国金融研究专题（新结构金融学）》虽然目前还没有新结构金融学方面的教材，但已经是清华大学金融学博士生课程。⁴³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探索性地推出了两门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课程《新结构区域经济学》和《新结构资源环境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应用课程也有作为MPA等专业学位课程，如林毅夫开设《新结构经济学政策设计》就是北京大学南南学院硕博学位（MPA）课程的必修课程。让我比较惊讶的是，之前我们可能不怎么了解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同仁已在兄弟院校开设了大量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专题课程，或者虽然课程名称不一定叫新结构经济学，但是课程内容涉及很多新结构经济学专题，或者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主线来组织课程内容。如安徽师范大学周端明老师1997年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讲授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中国经济的核心内容了，⁴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曹淑江老师开设的教育学领域的课程就以新结构

⁴³ 清华大学新结构金融研究中心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田轩教授，他围绕“不同技术创新类型所需要的金融合约安排不同”这一新结构金融学（也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议题，根据 Manso 教授的理论工作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并据此进行了专题课程建设。可进一步参考：Gustavo Manso, “Motivating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Vol.66(5), 2011, Pages 1823-1860; 田轩, 《创新的资本逻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⁴⁴ 据周端明教授的回忆：“1997年7月，承担97级政教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工作，该门课程分两个学期完成，第一学期讲《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第二学期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框架和内容基本是统一，但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却没有统一的教学框架和内容。同时，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该运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和

经济学视角作为课程主线，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的斯丽娟老师设计的新结构发展经济学课程还获得了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奖。总之，新结构经济学课程已在北大和清华等海内外兄弟院校作为本科生公共课与通识课、研究生核心课与学位专业课试点多年，具备面向全国推广的基础和条件。

但是，总体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体系向教材课程教学转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阶段，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开发相关系列课程是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点，前面列举的只是一些例子，新结构经济学课程开发潜力远未释放出来。新结构经济学每一个子领域都可以开发相应的不同类型的课程。就像教材一样，同一门课程也有很多版本的讲授方式，甚至有更强的授课教师的个性化色彩。当然，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也应该不断打磨自己的课程，建设系列新结构经济学“金课”。对于新结构经济学金课建设，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的建议很有价值：课程是人才培养的血肉，好的课程设置不仅要注重理论基础，还需体现专业特色，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并具备一定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来讲，其课程本身自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我自己在北大清华讲授多年的新结构经济学综合性基础课就深有体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为例，课程所要介绍的学科内容全面但紧扣中心思想（十大原理与领域主线），学科维度更高但没有隔膜感（可以直接对接新古典经济学），从现象出发秉承知成一体（现象-传统视角-新结构视角-理论-应用）。当然，这对老师和学生都很有挑战性。

方法重点阐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就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为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形成逻辑就是首先要阐释的内容，而在我看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老师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为计划经济的形成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假说，我把它命名林-蔡-李假说。于是，我就把《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重要内容，系统给学生阐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形成逻辑，传统计划经济是内生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采用赶超型发展战略，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在教学过程中，我认识到，林-蔡-李假说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计划与市场关系论述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讲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形成逻辑，我就给学生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逻辑，因为，林-蔡-李假说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是存在优先序的，如果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于一国的战略选择，那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否则这一体制就会不断地自我内生，从而改革就将走走退退，从而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自此后，《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就成为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的教材。2008年，我们修订了我校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把《当代中国经济》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以团队讲座的形式呈现，而林-蔡-李假说是课程的基本内容。同时，我还在全校开设《当代中国经济》的公共通识课程，选用的教材林毅夫和蔡昉老师的《中国经济》到林毅夫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而林-蔡-李假说是我教学的基本内容。除了本科生课堂外，我还在经济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经济学等硕士培养课堂内传播林-蔡-李假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和文一老师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都是学生基本阅读书目。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中国经济观。”可进一步参考：林毅夫、付才辉，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教研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沿着周端明教授的探索，下一步我们也将推进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课程建设。

（五）形成新结构经济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与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探索不同，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必须落脚到人才培养上，有很强的规范性。这实际上也就是理论体系向学科体系再向教材课程体系转化的归宿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也完全符合国家的政策方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6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教育教学转化，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活动。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教育部陈宝生部长解读《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时指出，以学科为支撑强化学科育人功能，实现学科课程、教学环节、教育人群三个“全覆盖”，教育引导學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如何建设高水平的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上结合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探索努力予以了高屋建瓴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120周年校庆之前来北大发表了一个系统的长篇讲话。在这之后，于9月10号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那篇讲话实际上是为9月10号的全国教育大会做了一个先声的理论准备。总书记此次讲话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讲了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事情。总书记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要包括五个子系统，或者叫五个子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思政体系。新结构经济学跟这五个体系都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学科的探索，这是教学的研究，这是教材的高水平的编写，这也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生动的案例，还是把人才培养贯彻到管理体系里面的一个生动实践。”⁴⁵吴岩司长也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质量要真正的提高起来有三大关键要素：专业、课程、教师。他也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须从这三个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入手，要努力打造“三金”：“金专”（一流的专业）、“金课”（一流的课程）、“金师”（一流的教师）。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同仁需要努力的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也肩负着国家战略。中央提出要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引领高等教育未来。⁴⁶对于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举措，

⁴⁵ 可参考：林毅夫、付才辉，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教研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

⁴⁶ 《关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高教司也做了明确解读：一是加快理论体系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形成理论体系，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二是深化专业改革，提升文科专业的内涵建设质量，建设新兴的文科专业；三是文科教育要来一场课堂革命，淘汰“水课”，打造“金课”，推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方法手段、实践教学的改革。⁴⁷作为新文科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管理教育改革也势在必行。目前，我国有全球最大的经济管理教育供给系统，有13个专业类、12422个专业点；1205所高校设立了相关专业，占全国高校数比例超过96%；在校生395.1万名，占比达24.5%，毕业生数97.2万，占全国毕业生人数的25.3%。目前我国仅仅经济学在校本科生人数就高达百万人，人数上就超过了数十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国家。因此，需要全面深化我国经济学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今年将开始按此试点。

三、全面深化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大发展

按照新结构教育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我国学科专业的设置应该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并随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调整。前面提到的中央提出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以及教育部正在推进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就是新时代重要的战略举措。经济学是教育部公布的13个门类的学科之一，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前引进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以及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单纯引进阶段。现阶段，我国需要加快推进经济学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相适应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改革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评价方式等关键环节促进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的大力发展，为做出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贡献做出体制上的努力。

按照教育部的学科目录，经济学门类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这个设置方式意涵理论经济学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可以不涉及如何运用于改造世界，运用经济学的作用在于改造世界，不用在认识世界上做出努力。这样的设置方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两个不可割裂的过程的看法。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前提则

⁴⁷ “新时代呼唤新文科建设” (https://www.sohu.com/a/283721429_99896157)。

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并且，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提升对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事实上，在教育部公布的13个学科门类当中，也只有经济学门类把理论和运用分别设立为一级学科。同时，学科设置是指挥棒，各个大学的师资力量、学生培养和资源是按照学科设置来配置，目前具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只是16个二级学科当中的二个，要招老师，培养学生仍都很难。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亟需改变当前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建议在经济学这一门类可以设置三个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三个一级学科之下再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若干二级学科。这三个一级学科中，前两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总结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并以此来编写教材，培养学生；后者仍然沿袭现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有利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有利于相互之间以其理论体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确立。⁴⁸

与学科设置的重大改革推进难度比较大有所不同，评价方式的改革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事实上，今年教育部和科技部等部委已经密集出台了一些推进改革的政策，以引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大原创性。如今年2月份刚出台的“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比如“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在职称（职务）评聘中，学校应建立与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细化论文在不同岗位评聘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实际水平、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教育部1月份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提出一些重要改革举措，比如：“把教材建设作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纳入‘双一流’建设和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估体系。支持优秀教材走出去，扩大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当然，学科相关的体制改革和政策举措都只是外部的因势利导，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还在于其内部的自生能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蓬勃发展需要同仁们的不懈努力，方可躬逢其盛！

⁴⁸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